

宁死不屈的农民革命英雄李来亨

易 畅

李来亨，陕西清涧人。少年时在陕北参加明末农民大起义，跟随李自成转战南北，英勇杀敌。李自成牺牲后，作为大顺军主力部队的重要将领和后期的统帅，李来亨继续高举农民起义的大旗，坚持武装反抗满族贵族集团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政策，反对清王朝的军事镇压和“招抚”阴谋，勇敢战斗，宁死不屈，表现了起义农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民族气节，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。

明朝末年，农民起义的烈火燃遍祖国大地。李自成领导的大顺起义军，经过十八年的艰苦曲折的斗争，终于在一六四四年春攻下北京，推翻了明朝的中央政权，建立了国号“大顺”的农民革命政权。但是，以吴三桂为代表的旧明大官僚地主阶级，不甘心自己的失败，对农民军怀着“刑我缙绅，掠我财物，杀我父君”的阶级仇恨，投靠正在扩大掠夺野心的满洲贵族集团，“剃发誓盟”，打着孔老二“兴灭继绝”的黑旗，在“为明主报仇”的叫嚣声中，疯狂地反扑过来。大顺农民政权立足未稳，就遭到满汉反动统治者的摧残和扼杀，李自成被迫退出北京，后来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不幸牺牲。

以多尔衮为头子的满族贵族集团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，取得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以后，恣意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政策。他们强行“圈地”，使广大贫苦农民破产流亡，甚至使某些中小地主也受到损害，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；还下令剃发，强行泯灭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。清王朝的压迫和奴役，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。为了打击主要敌人，大顺军主力在高必正、李过、李来亨等领导下，掀起了反压迫反奴役的斗争高潮。从一六四五年到一六四八年，他们转战于湖南、湖北、贵州、广西等省，多次大败清军，收复许多被清军占领的重镇要地。但是不久，高必正被农民军叛徒孙可望杀害，李过又不幸病故，大顺军处境极为困难。在这危急关头，“小闯王”李来亨力挽狂澜，肩负重任，率领大顺军主力三万余人实行战略转移，从广西回师北上，于一六五二年来到湖北兴山县境内的茅麓山区，建帅府于白羊寨，凭险而据，立垒筑寨，并与大顺军其他部将刘体纯、郝摇旗、袁宗第“连砦相结，声势遥相依”，形成了一个包括鄂西、川东十四个县的农民革命根据地，与清朝政权对峙、斗争十余年，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。

茅麓山属于大巴山脉，地处川鄂咽喉。这里万岭插天，人烟稀少。李来亨面对强敌追剿围堵，供应极端缺乏和穷山恶水的艰苦环境，响亮地提出了“镌虏姬民”的战斗口号，明确宣布农民军的目的就是打击和推翻满洲贵族集团的反动统治，要象慈母看护孩子一样爱护人民。李来亨“招来居民与士卒杂处”，“屯耕山田，岁收麦粟草绵，供粮食衣履”。至今兴山县白羊公社还广泛流传着“小李为王”时代的歌谣：“人吃萝卜马吃菜，吃了三年还有半边在。”农民军还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，“行什一之税而民租减”，“革盐法之弊而课税蠲”，继续实施李自成“均田免粮”的起义纲领。他们还常常突破敌人的封锁，“私遣入市盐铁荆西，居民或与往来市贩。”农民军对群众“平买平卖”、“秋毫无犯”，深受人民群众拥护，连清朝的官吏也惊呼“邑人从乱如归”，“其民好乱从贼者众”。农民军还在长江里“邀抄”官府和巨商豪富的货船，没收他们搜括、剥削的财货。

由于李来亨领导农民军坚持了农民起义的正确路线，所以能迅速地站稳脚跟，扭转被动的局面。他们出奇制胜，主动进攻，北袭襄、郢，东下荆、宜，西攻巴蜀，南取施州，攻占县城州府，镇压清朝地方官吏和地主豪绅，打得清军闻风丧胆，“莫敢西窥”，“楚蜀守将不能御”，成了清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。

一六六二年，各地农民军和抗清力量先后被镇压下去以后，李来亨领导的茅麓山根据地岿然不动，清朝皇帝命令血腥屠杀农民军的刽子手、四川总督李国英，率领四川、湖北、陕西、河南四省的精兵十万、饷夫二十万，凿山开道，对李来亨农民军大举进犯。李来亨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毫不畏惧，率领将士奋勇出击，杀得“楚蜀震动”。一六六三年六月，在兴山谭家寨，李来亨率领农民军万余人与三万清兵血战了四天四夜。二十七日早晨，李来亨乘大雾出奇兵突袭清营，击毙清军统兵大员，使清廷“北协湖广之师大挫”。同年八月，在著名的大茶园战斗中，秋雨连绵，泥泞路滑，李来亨趁清军“衣甲尽湿，军士有懈心”之机，出兵夜袭。事先扮作商贩打入清营内部的农民军“忽揭大旗，号呼起火”，里应外合，打得“虏兵大溃，杀伤万计”。湖广总督张长庚败退四百余里，“走保夷陵（今宜昌）”，湖北提督董学礼狼狈窜逃当阳。农民军还长驱直入，西攻巫山，大败蜀兵，四川总督李国英慌忙呼救，乞求清廷“迅发大兵”救援。农民军多次取得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，使清朝的军事“会剿”遭到惨败。

“所有一切压迫阶级，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，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：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，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。”清朝统治者在血腥镇压农民军的同时，搬出孔孟之道，大耍“招抚”阴谋。满族统治集团和那些投靠清廷的汉族官僚地主、反动儒生，把清军对人民的野蛮屠杀和掠夺说成是“代天行仁”，蛊惑人心地向起义军叫嚷“大势已去，天命有归。”只有投降，才算得“志士仁人”。在大顺军抗清斗争初期，清廷就曾企图招安李过、李来亨等，然而“招抚六次，人信不还”，连招抚使也给杀了。清军凭借反革命暴力围追堵截十几年，还是打不垮英勇顽强的李来亨，只好再施“招抚”诡计。清朝皇帝假惺惺地在诏书中装着同情起义军的样子说：你们“乡里远违，坟墓捐弃，亲戚睽绝，骨肉仳离，揆诸人情，能无动念？”只要投降，政府就“不吝高官厚赏”；还找到李来亨的一个在清朝做

官的什么“表舅”去劝降。面对这股招安投降的逆流，李来亨发扬李自成当年踏倒皇极，焚毁“神器”的革命精神，毫⁴不受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和清廷的高官厚禄的欺骗和引诱。

“招安”阴谋一次又一次地破产了，清朝统治者又凶相毕露，竭尽全力实行军事围剿。一六六三年十月，清廷命令反革命“名将”都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，都统图海为定西将军，调集提督、总兵、总督共十五员，率领八旗禁旅和满汉官兵二十万，“尽起楚蜀丁夫”数十万人，“⁵挽粮赴军”，杀气腾腾地向农民革命根据地猛扑过来。农民军浴血苦战了十个月，刘体纯、郝摇旗等将领相继牺牲，李来亨所部被重重围困在茅麓山上。他临危不惧，沉着应战，使清军“死者积岩谷”；最后，因粮尽援绝，清兵由叛徒引路乘雾偷袭，山寨才被攻破。一六六四年八月五日，来亨全家和他的亲密战友们，全部纵身烈火，英勇就义。李来亨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满汉反动统治集团，以致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，他们都谈虎色变，把办事艰难比喻为“又上茅麓山耶”。

毛主席在关于评论《水浒》的重要指示中指出：“《水浒》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。”“宋江投降，搞修正主义”，“让人招安了。”李来亨继承李自成开创的革命事业，坚持农民起义的正确路线，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，在军事进攻面前不低头，在“高官厚赏”引诱下不受骗，艰苦卓绝，宁死不屈，这是对《水浒》宣扬投降主义、鼓吹叛徒哲学、诬蔑农民革命的种种谬论的有力批判，也是对那种把宋江受招安、搞投降说成是所谓“农民的局限性”之类的阶级调和论的有力批判。

《水浒》为了美化叛徒宋江，写他投降朝廷后去抗辽。有人据此鼓吹“投降有理”、“叛徒有功”论，胡说什么宋江“受招安反映了人民的愿望”，是所谓“爱国主义思想”，“立下了汗马功劳”等等。毛主席指出：“民族斗争，说到底，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。”宋江投降，搞修正主义，他从来不是维护被压迫阶级的利益，他爱的是赵宋皇家。这样一个奴才，那有什么“爱国主义”可言！我们从李来亨等农民领袖在根据地始终坚持李自成“均田免粮”斗争纲领的事实中可以看到，农民革命军的爱国主义，首先体现在热爱李自成所创立的大顺农民政权、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上面。这说明在封建社会里，革命农民的爱国观念首先是从自身最迫切的阶级利益出发的，而绝不是所谓“爱国”必须“忠君”，绝不是宋江式的投降主义。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，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出现以前，农民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统治，无法引导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取得彻底胜利，但是只要有剥削有压迫，他们总是要反抗要斗争的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，正是这种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农民革命斗争，推动着社会的前进。

今天，我们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结合评论《水浒》，总结历史上农民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，对于揭露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，深入批判现代的投降派刘少奇、林彪一类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有着重大的意义。我们要歌颂真正的革命英雄，批判形形色色的投降派，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。

（中共宜昌地委理论小组供稿）